

华人新移民研究

曾少聪 曹善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关键词] 华人新移民; 大陆、台港澳新移民; 东南亚华人二次移民

[摘要] 华人新移民包括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移民、台港澳移民和东南亚华人二次移民。本文拟探讨华人新移民的分布、特点、新移民内部以及新、老移民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国际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 跨国移民将不断增加。华人新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她改变了海外华人分布的格局, 赋予海外华人新的特点, 并为移居国和祖籍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 D5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5)06-0060-06

New Chinese Emigrants Study

Zeng Shaocong & Cao Shany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81, China)

Keywords: new Chinese emigrants; new e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second emigrant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bstract: The new Chinese emigrants include the e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kong, Macao, and the second emigrant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1950s. The increasing new Chinese emigration is significant not on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but also fo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ir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policies regarding race and ethnicity.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new Chinese emigrants from the above five region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s well as 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emigrants. It also predicts possible trend of the new Chinese emi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一 前言

国内学术界在华人新移民的研究方面, 庄国土和朱慧玲从纵向比较了新老移民的异同, 然后提出了新移民的特点^[1]; 赵红英从横向比较了移居北美与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异同, 并指出了其不同特点^[2]; 程希比较了日本与欧洲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异同^[3]; 李明欢等主要探讨了中国移居欧洲的新移民^[4]; 李其荣等探讨了移居北美的新移民^[5]; 黄英湖等探讨了东南亚华人的二次移民^[6]; 台湾学者张存武则分析了台湾人移居东南亚的情形^[7]; 叶文振对中国大陆特别是福建的非法移民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8]; 高伟浓等把中国新移民置于国际移民背景下做了比较全面的探讨^[9]。西方国家一些移民机构也对华人新移民进行研究, 他们的目的是为西方国家制定移民政策服务。国外一些学者如罗纳德·斯凯尔顿等^[10], 他们在探讨国际移民

时, 大多会涉及华人新移民的问题。虽然国内外学者有关华人新移民的研究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但是, 以往的研究欠缺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华人新移民的问题。此外, 也缺少对大陆新移民、台港澳移民和东南亚华人二次移民进行的比较研究。

有关华人新移民的概念, 庄国土将之界定为: 20 世纪后期跨国移居的华人(指种族、文化意义上的华人, 英文对应词为 Ethnic Chinese)^[11];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 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者”^[12]; 在美国, “新移民是指 1965 年美国新移民法颁布后, 从世界各国移居美国的移民”^[13]。随着华人新移民的增多, 学术界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华人新移民”一词。本文中的华人新移民是相对于老移民而言的, 其时间限定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因为台湾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派出大批留学生, 许多留学生学成以后滞留在所在国而成为新移民; 香港移民

[收稿日期] 2005-09-01

[作者简介] 曾少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曹善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003 级硕士研究生。

是从60年代开始的。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是基本终止的。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才出现大批公派留学生,还有自费留学生以及其他合法和非法的海外移民。二战以后,东南亚一些国家推行扶植土著民族、限制和排挤华人的政策,有些国家甚至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加上某些国家战乱不断,许多华人被迫外逃,移民到欧美国家,也有一部分人回到中国。对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东南亚华人,我们也把它放在华人新移民之列。虽然南亚和非洲等地区也存在华人再移民,但考虑到东南亚华人二次移民比较典型,人数相对多一些,所以本文着重讨论东南亚华人二次移民问题。

二 华人新移民的分布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国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只有少数人获得出国定居的机会。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49—1978年我国批准的因私出国者仅21万人,同期港、澳、台地区出国定居者也在少数。”^[14]1985年11月,我国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申请出国是中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为中国大陆向外移民提供了法律依据。近20多年来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的共有250多万人,其中移居美国的大约50万^[15];移居加拿大的约30万;在日本大陆新移民人数约38万;经不同途径从中国大陆移居西欧国家的新移民约在30万至35万之间;移居澳大利亚的约10万;移居东南亚的人数约100多万。

在大陆新移民中,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出国的人数占有一定的比例。据中国大陆有关部门指出,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共有58万余人出国留学,分布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16]。过去20年,共有46万大陆学生留学海外,其中九成以上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而截至2002年底,回国者只有14万人。

还有一些新移民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出国,劳务输出人员大部分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无业者,他们在国外主要从事建筑、种地等体力劳动。如中俄劳务合作输出的劳务人员从1990年的1万人上升到1992年的1.7—1.8万人,其中,46%从事建筑,47%从事季节性农业工作。中国公司从1982年进入新加坡建筑市场开始,派往新加坡的劳务人员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到1999年有7.3万人以上;同时派往韩国和日本的劳务人员也不断增长,分别达35,760万人和33,028万人;1999年,在美国的中国劳务人员数量达17,746万人^[17]。随着中国公司与外国公司合作的发展,劳务人员会不断增加,而发达国家看中的是我国低廉的劳力和他们的埋头苦干精神。

中国少数民族也加入到跨国移民的行列。据李安山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到分离主义势力活动和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1959年西藏地区约10万左右的藏族人在西藏叛乱失败后,迁移到印度等地;1962年伊塔事件后,新疆地区6万多维吾尔、哈萨克族人移居前苏联^[18]。

如今,改革开放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开放意识,以出国留学、打工赚钱为目的的少数民族的海外移民正蓬勃发展,如70年代中期,我国南部的2万多壮族移居法国;约10万多朝鲜族以留学、劳务、探亲、国际结婚等方式移居国外,大部分流向韩国;满、回、蒙古族也是移民较多的少数民族,分别占全国海外移民的0.70%、0.45%和0.37%^[19];在哈萨克斯坦,20世纪80年代以后抵达该国的维吾尔族新华侨华人估计约1万人,从事中哈边贸活动;在美国,有50万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其中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再移民,自改革开放以来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也有不少。2003年,旅美华人中有4.7万人来自中国的内蒙古,1.9万人来自中国的西藏^[20]。

华人新移民中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少人铤而走险走上偷渡出国的道路,人们称为“人蛇偷渡”。以来自中国福建长乐的非移民为例,在15年中约20万人偷渡入境美国^[21],这些非法移民,大多数是来自农村教育程度较低、没有英语语言能力的青年,女性约占十分之一^[22]。现在不仅沿海地区的人非法出国,连内地的农民也秘密踏上了非法出国的道路。

从中国大陆非法偷渡到国外,进入不同国家交给“蛇头”的费用也不同,据有的学者统计每一人蛇偷渡到意大利需交1.2—1.5万美元;偷渡英国则需要3万美元左右;偷渡美国需交3—6万美元;偷渡澳大利亚则交人民币1.8万元;偷渡日本要交人民币8—10万元;偷渡韩国为人民币6万元左右。“据警方透露,已破获的专门偷渡中国非法移民的三个国际犯罪集团,在1999年9月—2000年7月就将5,000名中国非法移民偷运到意大利,平均每年的偷渡所得为6,500万美元(4,200—5,000人)。他们组织偷渡者在北京乘班机飞往乌克兰或南斯拉夫,在那里非法移民躲进暗层的汽车,途经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而后到达意大利”^[23]。显然,走私人口和组织偷渡而牟取暴利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犯罪活动屡禁不止,而有些国家对人口偷渡集团和偷运人蛇的刑罚较轻也使一些犯罪分子有恃无恐,如在美国一个贩卖海洛因的毒贩被抓获,肯定要在狱中度过16至20年,而一个偷运100名中国人蛇入境的蛇头最高才面临18个月的监禁,而一旦成功却有300万美元的回报^[24]。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及日本是非法偷渡者的主要目的地,还有一部分人偷渡到新加坡和韩国。据黄润龙统计,“中国非法移民偷渡到美国的主要路径是从香港经拉美的安提瓜岛,到美国的旅游胜地迈阿密;第二条路径是从香港经东欧(或西欧)到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在拉巴斯得到具有美国签证的台湾护照,将照片替换,就作为台湾访问者合法地到达美国迈阿密或纽约;第三条路径是从香港到缅甸或泰国,等待玻利维亚的护照搞好后,立即经拉巴斯(或巴西)进入美国;第四条路径是从香港经缅甸、欧洲,再转到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尼加拉瓜或巴西(中国护照可免费签证),最后到达美国东

海岸、加利福尼亚；最后一条路径是从泰国经拉美的巴哈马，由轮船偷渡到美国佛罗里达。偷渡费在20世纪80年代初仅为1.8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则为3.2万-3.5万美元²⁵。因美国在“9·11”事件以后加强边防安全设施，所以人蛇偷渡美国之路更加艰难，而蛇头索取费用更高，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蛇”敢冒着生命危险飘洋过海呢？据叶文振分析，非法移民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偷渡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实际成本或代价”。他还认为“人蛇偷渡集团的存在和活动，是人蛇将非法移民的决定变为具体偷渡行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²⁶。一些国家的大赦也为“人蛇”偷渡吃了“定心丸”，国内外媒体对海外移民成功事例的夸大宣传，也为偷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饶恕的是国际“人蛇”集团的存在和他们的猖獗。不可否认，在地区间经济不平衡的情况下，有些人为了赚更多的金钱，踏上了偷渡之路，他们只想到偷渡成功后收入的可观，却没能考虑到偷渡过程中的生命危险和在所在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

是什么原因促使大陆人民进行跨国移民呢？据Henrik Olesen等人对战后国际移民的研究，“移民峰”的起点约在人均收入1,500美元左右，而终点则约为8,000美元。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1,000美元，但东南沿海许多省市人均收入已超过1,500美元，从那里开始的出国热迅速传到内地，甚至有些人不惜借高利贷出国²⁷。笔者认为中国人口迁移海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经济方面的差异。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于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如果移民后的预期所得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为就会发生”²⁸。比较一下中国与美国的工资收入，则一目了然。1990年中国各种行业的平均工资为2,140元人民币，而同年美籍华人的月平均收入为1,850美元，为中国职工收入的50-60倍。此外中国的物价、消费指数和恩格尔系数都很高，而人民的实际购买能力比较低，甚至不足美国贫困人口生活线的30%²⁹。在网络信息的出现和交通工具不断改进的情况下，便出现了大量的华人新移民。不过，有的大陆新移民不只是为了糊口出国，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新移民不同于他们的前辈安于现状，而是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去。目前，在大陆出国成为一种时尚，学习好要留学，学习不好也要出国留学。很多人持只要出国就能使全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思想；还有些人认为反正是要“跳槽”，还不如“跳”到国外去发展等，把出国美化成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因此在大陆刮起了前所未有的跨国移民潮，移出地从传统的福建、广东两省遍及全国各地。

据记载，20世纪50、60年代，英国需要大量服务行业的劳力，香港新界有10多万村民移居英国，如今约18万港人在英国³⁰。到目前移居加拿大的香港新移民约30万人；1980年以前有5.3万香港人赴美，加上后来入境的香港新移民，在美国约20万人；澳大利亚约18万人；其他国家约6万左右，即香港新移民总人数为90多万。自

1984年中英签署有关1997年香港无条件回归中国协议，有些港人担心香港的未来，纷纷移民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但后来随着“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香港移民海外人数逐年减少。香港移民主要以留学、技术移民、商业移民为主。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陆续出现了海外移民潮，台湾新移民的主要去向是美国和加拿大，约占移民总数的70%。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新移民约百万人，其中60万流入美国³¹。知识分子占台湾移民的大多数，他们居住在发达国家的大中城市。台湾移民主要以留学方式出国后定居，寻求较舒适的工作机会和发展机会。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已有台商向东南亚投资，直到1997年底东南亚遭遇金融危机为止，台湾商人投资东南亚才开始减退。“随着台商在东南亚的投资经商，出现台湾人‘移居’东南亚的热潮。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台商及其眷属的人数在东南亚等地已颇具规模。……保守的估计，移居东南亚的海外工作者约达10万人左右，此种因工作而长期居住在岛外，但尚未久到向当地人籍的程度，所以‘暂时出国’与‘长期移居’之间的界限较难厘清。”³²

二战以后，东南亚纷纷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一些国家推行扶植土著民族、限制和排斥华人的政策，甚至有些国家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加上某些国家战乱不断，东南亚地区相当数量的华人不得不离开东南亚，移民到西方国家，也有一部分人回到中国。这使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侨华人数大幅度地减少，成为海外华人地域分布变化的重要原因。如越南华侨的人数原来近200万，经过1979年以后的大量向外逃亡，现在只剩70万。1975年越南政治局势发生剧变之后，有12万名华裔难民为法国所收容，英政府接收了2万多越南华人难民，其他西欧国家也分别收容了数千人³³；约有28万越南华裔逃难到中国境内；据统计，从1976年至1990年，美国收容了越南、缅甸和老挝难民共957,316人，其中华人占难民总数的三四成³⁴。1986年，在澳大利亚政府曾进行的以祖籍及语言为标准的人口统计中，填报属于华侨的有17.3万人，其中出生于越南的占8.3万人，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占4.8万人，出生于新加坡的有1.6万人。此外，还有一些来自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如菲律宾等。1986年荷兰华侨人口在西欧仅次于英、法两国，共有5万多人，其中的一半是1966年以后从东南亚的印尼移民而来的。原来居住在东帝汶的华侨，因为该地政治环境的改变，大量移居葡萄牙。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如泰国和文莱等，战后数十年来也都有不少的华侨华人进行了二次移民³⁵。其中早期移居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少数民族也因为战乱等原因进行了再移民，如1975年以后印支地区约23万多的苗族人迁移到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区；约2.6万多瑶族人从印支国家移居至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

华人新移民不同于传统的老移民大多移居东南亚，他们主要流向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据估计,50年来亚洲以外新增的华人移民约为400万,直接影响了海外华人地域分布的变化。在亚洲地区华人人占海外华人总数的比重已从1980年90.8%降到1999年77.63%;美洲地区华人人占海外华人总数的比重由1948年的2.4%上升到1980年的6.3%,以至升到1999年的17.43%;而欧洲和大洋洲华人人占海外华人总数的比重分别为2.6%和1.3%^[36]。

新移民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和劳力市场分割理论综合分析,我们认为移民到这些国家的直接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国内的收入;而且在这些发达国家,本国劳力不愿意进入低效率低收入市场,从而为大量中国移民进入这些国家填补其空缺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些国家除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外,还需要大量劳动力和技术工人;除了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能提供更多的就业、赚钱机会外,这些国家的鼓励移民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二战后,美国独一无二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吸引着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移民涌入美国“淘金”。随着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规定每年给中国2万名进入美国配额,大量的中国移民把目标定在美国。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配额有增无减,1996年美国国会给了1,000个所谓‘一胎化’庇护配额和1,000个所谓‘西藏居民’移民保证配额”。加上“美国的政治避难、大赦等做法客观上也助长了中国非法移民的增加”^[37]。1967年,加拿大政府宣布“以平等相待世界各地来的移民。在加拿大经济发展与人力需要所能容纳的情况下,加拿大将尽量吸收新移民”^[38]。促使大量的华人以留学、技术移民、商业移民、家属团聚、难民等方式进入加拿大。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废除“白澳政策”,继而推出优先吸收经济移民和技术移民等制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确定每个年度可接受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总额度保持在8-16万人之间,这一政策是为了鼓励商业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而制定的”^[39]。可见这些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外来移民的工作和努力,而华人新移民也为这些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 华人新移民的特点

与华人老移民相比,华人新移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移民的目标国是发达国家。如上所述,500多万华侨华人新移民中,移居发达国家的约450万人,其中进入美国的200多万;加拿大为70多万;西欧国家的100多万;日本为40万;澳大利亚为40万。这些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发达、提供的机会多,而且不像东南亚一些国家采取限制、排斥华人的政策,而且接收移民时优先考虑符合本国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投资移民,或愿意从事本国人不愿意做的或国内劳动力不足而无人从事的职业的移民。这些发达国家没有专门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所以华人新移民在当地谋生较容易。在这些发达国家中不断出现“连锁移民”(Chain Migration,指一人移民后,又帮助其亲

属朋友相继移民)^[40],所以在发达国家,华人新移民会不断增加。

第二,受教育水平高,专业技术人员多。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华人新移民的文化水平远远高于老移民,因为发达国家的移民法律中,均有优先接受技术移民及吸收本国匮乏人才的条例,所以,流向发达国家的华人新移民中,专门人才及其亲属的比例较大。

第三,华人新移民越来越年轻化,尤其是近年来新移民的年龄更趋年轻。据估计,新移民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1992年纽约市统计局资料表明,该市中国移民中有40%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41]。中国大陆有些地方从8岁改为6岁上小学,而留学人员一般是高中、大学毕业之后直接出国继续深造,所以新移民具有更加年轻化、活力化的特点。正是因为年轻和拥有知识使新移民在国外能迅速提高适应能力和工作技能,也具备成为高级专业人士的条件,而且可以在几年内就进入当地主流社会。又因为大部分成年新移民在中国完成高中或大学的学习,受到深厚的中华文化教育熏陶,所以移居到国外很多年之后,他们的思维模式既具中国特色又有当地的色彩,具有异于中国也异于所在国的第三种思维方式,即演变成海外华人合成文化,她使华人新移民能更好地适应所在国,能更好地发展自己。

第四,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新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属投资移民、商业移民,尤其是1984年中英签署香港问题协议之后到1997年,携带资本到异域创业的香港商业移民的规模不可忽视。在将近70万的香港移民中,可能有30%属商业移民,据估计,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1996年,香港商业移民每年带出的资金在200亿美元以上。台湾的商业移民在移民中也占一定比例,1993—1994年移居加拿大的台湾人中,商业移民约占60%^[42]。东南亚华人中商人居多,也有不少投资移民和商业移民到发达国家,目前大陆的投资移民不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陆的投资移民、商业移民也会多起来。

第五,在其居住国的处境较好。因为新移民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有的还携资本到国外发展等,他们在居住国的处境比较好。例如台湾人移居东南亚是以“投资的中小企业主(以制造业为主)和派驻当地的台商干部为主,附带是为家庭团聚而将其家人子女一并移出者,他们携其资金投资办厂或外派工作,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和获得较为优惠的外商待遇,这与昔日历史上东南亚华人移民时艰苦的境遇大不相同。”^[43]

第六,女性新移民增多。因中国传统的影响,老移民中很少有女性移民,而新移民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多,她们不仅以家庭团聚的方式,很多以留学、技术、劳务等方式出国。截至1990年,到国外工作或留学的人大约24万人,其中男性占66%,女性占34%^[44]。据调查发现,台湾移民海外人口当中女性比例大于男性,占54.4%,年龄层以青壮年居多,教育程度多为大专以上程度,计占七成左右^[45]。又如,目前在柬埔寨有五六千中国劳工,其中绝

大部分是女工，她们主要集中在金边及其周围的 180 多家大小制衣厂，担任技术工人或管理人员^[46]。

四 新移民内部的关系以及新老移民之间的关系

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新移民之间不仅存在合作，也存在着竞争。但不管是中国大陆移民，还是港、澳、台移民和东南亚华人移民，他们身在异乡总是容易团结起来，为谋求华人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也开始携起手来。在新世纪第一个中秋节前夕，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个华人社团——旅加北京联谊总会和加拿大眷村联谊会，在温哥华华埠联合举办了晚会。加拿大眷村联谊会会员均系在台湾眷村生活过的台湾移民。所谓“眷村”，是指 1949 年国民党战败退居台湾后，在台各地建立的军、政教人员集体宿舍大院^[47]。华人新移民在留学过程中不仅与当地学生交朋友，而且结识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同学，他们之间成为朋友，关系也比较融洽。

新移民必然要与华人老移民发生联系。在华人社会里，形成了新、老移民的群体。对于家庭团聚的新移民来说，他们自然会得到家人和亲友的关照。至于投资移民，他们是携带着资本到移居地办工厂、开商店等的，他们在移民之前大多已在移居地购买了住房和厂房，由于他们有比较雄厚的资本，所以也容易被当地的华人社会接纳。再说，虽然投资移民以港、澳、台移民为主，然而，港、澳、台移民的先民和东南亚华人的先民大多来自闽、粤两省。例如菲律宾华人中的 80% 来自福建的闽南地区，他们通常可以找到自己的亲人和宗亲，只要他们需要便很容易得到华人社会的帮助。至于非法移民，他们刚到东南亚国家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有亲友就投靠亲友，假如没有亲友的，他们通常也在华人社会生活，得到华人社会的关照。菲律宾移民局官员和警察经常到华人开设的工厂、报社等单位搜查非法移民，有时非法移民来不及躲藏，就被抓到移民局关起来。这时老板会酌情拿钱疏通关系，通常在两三天之后，被关押的非法移民又会被保释出来。

不过，新、老移民之间也存在一些隔阂，甚至冲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老移民与新移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新移民的歧视和排斥上。老移民由于较早来到国外，经济条件比较好，有的人则瞧不起刚来的身无分文的新移民，有的华人社团不让一些新移民加入。特别是存在一些新移民到东南亚后进行非法的贩毒活动，或参与抢劫、绑架华人的活动，再加上当地社会带有种族歧视观点的媒体的炒作，使当地的华人对新移民带有偏见。老移民认为以前他们都是循规蹈矩，勤劳致富，而现在有些新移民想不劳而获，或从事些非法的活动以求“暴发”致富，因此他们鄙视这些新移民，所以宗亲会和同乡会不让他们参加，甚至

把他们排斥于华人社会之外。不可否认，新移民中有害群之马，他们损害了新移民和华人的形象。还有一些华人华裔二三代，他们对中国大陆不大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其祖父母留给他们的，所以常常认为中国仍然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他们对华人新移民也带有偏见，甚至抵触的心理，从心底就瞧不起从大陆来的新移民。其实许多新移民与早期的移民一样，他们抱着发财致富的宏愿，只要条件许可，他们也有可能像现在取得成就的老华侨华人那样，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华人社会也注意到新移民的困境，他们开始主动提出帮助贫穷和处境不利的华人新移民^[48]。

五 结论

人口迁移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华人新移民会不断增加。移民并不仅仅限于从移出国流向目标国，也包括移民出入于移出国与目标国之间，或在多个目标国之间来来往往的复杂过程，在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华人中就存在“宇航员现象”。这种现象是指某个家庭申请移民到某个国家，但在到达以后，只有妻子和孩子们实际定居下来。养家的人（有时不是丈夫）却返回香港或台北继续其生意或职业，并定期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之间与家人团聚。所谓“太空人”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华人跨国家庭的新模式与新活力。另一方面，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了“可携带技能”，具有在全球范围内移动的可能性，当代华人移居模式可以是 A（祖国）→B（移居国）→C（移居国）→D（移居国）→A（祖国）这样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近年来大量的港台移民由北美、澳洲回归的现象则反映了这类移民的跨国流动性^[49]。

由于新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导致海外华人的分布和华人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高度集中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而逐渐向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北美发达国家分散。此外，华人新移民的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华人新移民中有掌握高科技的人才、专业人才、大学教授、还有技工等等。因为普遍受过较好的教育，所以新移民在所在国积极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新移民也认识到参政的重要性，积极参政。在当今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已经无法小看日益强大的华人的政治力量了。新移民的增加使华人社团、中文学校、中文报刊、中医诊所也与日俱增。华人新移民与老一代华侨华人相比，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当地社会的活动，争取融入主流社会。凭他们的聪明才智、刻苦耐劳，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所在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海外移民的人数还会不断地增加，华人新移民将为居住国和祖籍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注 释】

[1] 庄国土：《对近 20 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

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朱慧玲：

- 《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态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 [2] 赵红英：《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八桂侨刊》2001 年第 3 期。
- [3] 程希：《人才流失与新移民：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前往日本和欧洲的留学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
- [4] 李明欢：《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
- [5] 李其荣：《1965 年以来美国华人新移民的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5 期。
- [6] 黄英湖：《战后华侨的再移民及其原因剖析》，郭梁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 年版，第 146—152 页。
- [7] 张存武：《对中国海外移民多角度的思考》，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一卷：移民、华商与经贸），台湾，华侨协会总会出版，2002 年版，第 63—72 页。
- [8] 叶文振：《福建沿海非法移民潮的原因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 [9] 高伟浓等著《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 页、第 132 页。
- [10] 罗纳德·斯凯尔顿：《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国际移民 2000）2001 年第 3 期。
- [11]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50 页。
- [12] 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新移民的工作》，《侨务工作研究》1996 年，第 1 期。
- [13] 同 [9]，第 83、91 页。
- [14] 蔡德奇、江永良：《海外华人地域分布变化特征及原因》，《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 [15] 同 [11]，第 356 页。
- [16] 《中国留学人员达 58 万 其中回国 15 万人，27 万人仍在校学习》，载香港《文汇报》，2003 年 6 月 26 日，转引自《华侨华人资料》2003 年第 4 期。
- [17] 尹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发展综述》，《人口学刊》2002 年第 6 期。
- [18] 李安山：《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特点、辨识标准及人数统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 [19] 黄润龙：《海外移民和美籍华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31 页。
- [20] 赵和曼：《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99—200 页。
- [21] 〈美〉彼得·邝著、王冰等译《黑着：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0 页。
- [22] 同 [8]。
- [23] 同 [19]，第 274 页。
- [24] 同 [8]。
- [25] 同 [19]，第 275、276 页。
- [26] 同 [8]。
- [27] 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打印稿。
- [28] 李明欢：《20 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
- [29] 黄润龙：《近十年我国大陆海外新移民》，《人口与经济》1998 年第 1 期。
- [30] 章成友：《英国华侨华人社会面面观》，《侨务工作研究》2003 年第 6 期。
- [31] 朱慧玲：《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态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 [32] 王立礼：《论台商对大陆投资的进程与经营策略——兼与台商东南亚投资比较》，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打印稿，2003 年印，第 53 页。
- [33] 李明欢：《当代欧洲华人口构成剖析》，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36 页。
- [34] 〈美〉麦礼谦：《在美越南、缅甸、老挝华人的同乡组织初探》，萧效钦、李定国主编《世界华侨华人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42—243 页。
- [35] 黄英湖：《战后华侨的再移民及其原因剖析》，郭梁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 年版，第 146 页。
- [36] 蔡德奇、江永良：《海外华人地域分布变化特征及原因》，《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 [37] 同 [9]，第 1 页。
- [38] 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54 页。
- [39] 同 [9]，第 132 页。
- [40] 同 [11]，第 356 页、第 359 页。
- [41] 高伟浓、温北炎：《从暨南大学的个案看中国留学生的为国服务》，载 <http://192.38.121.218/issco5/documents/GaoWeinongpaper.DOC>，2004 年 4 月 14 日。
- [42] 同 [11]，第 359 页。
- [43] 同 [32]。
- [44] 苑雅玲、周祝平：《迎接人世挑战 关注人才迁移与流动——“中国—加拿大迁移与流动国际研讨会”综述》，《人口研究》2002 年第 5 期。
- [45] 《台湾侨委会公布台湾地区移居海外侨民概况调查结果移民海外比例多于男》，载台湾《宏观周报》，2003 年 5 月 7 日，转引自 <http://hqhr.jnu.edu.cn>，2005 年 4 月 6 日。
- [46] 曾少聪：《全球化与中国海外移民》，《民族研究》2003 年第 1 期。
- [47] 《温哥华两岸同胞共度中秋》，载《侨务工作研究》2002 年第 1 期。
- [48] 曾少聪：《海外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55—456 页。
- [49]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16、225 页。

【责任编辑：郑一省】